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之魂

父辈歌

中 华 之 魂

——父辈歌

(下)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97 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审定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辈歌/中华之魂丛书编委会编. —2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7

(中华之魂丛书)

ISBN 7-80078-230-1

I. 父…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57 号

中华之魂——父辈歌(下)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交民巷 23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3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8000—28000 册

ISBN 7-80078-230-1/K·10

定价:86.50 元/套(5.76 元/册)

目 录

垂范后辈的伟大人格

——父亲朱良才

事迹忆述……………新加 新华 新民 新春 筱秋(274)

怀念与思考

——爸爸陶勇和妈妈朱岚

的惨死说明了什么……………陶小勇(286)

父亲最后的两天……………舒 乙(298)

忆难忘

——纪念爸爸朱剑凡……………朱仲丽(313)

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纪念进步教育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志士

朱剑凡先生诞生 100 周年……………仲止 竞之(317)

他心中只有人民

——忆我的父亲王维舟……………王庆生(321)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回忆父亲谢子长烈士……………谢绍明(324)

怀念父亲

——刘志丹……………刘力贞(336)

春风浩歌唤晚辈 服务人民做瑰宝

——回忆我的爸爸范长江……………范苏苏(341)

求实廉洁激励后人

——忆爸爸曹菊如..... 曹建南(346)

忆亲爱的父亲

——周文..... 何 枫(355)

爸爸祭..... 朱统一 朱 丽(360)

我不能不哭!

——怀念我的父亲邵荃麟..... 小 琴(370)

生命、爱与智慧的奉献

——记父亲柳湜

坎坷悲壮的一生..... 柳树滋(380)

高唱军歌,前进!

——关于父亲郑律成

二三事..... 郑小提(395)

缅怀我们崇敬的父亲

——陈养山..... 陈建宇 陈光宇 陈平宇 陈震宇(401)

后 记..... 编委会(405)

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设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毛泽东(1938年为鲁迅小学毕业生题)

垂范后辈的伟大人格

——父亲朱良才事迹忆述

新加 新华 新民 新春 筱秋

冬雪化，春草绿。转瞬之间，父亲朱良才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两年前的那个春日，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数千人为着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一堂。八宝山院内摆满了一千多辆汽车，院外来参加遗体告别的汽车从西边骨灰堂山脚一直排到东边玉泉路口，三条行车线都堵塞了。八宝山工作人员说：这是建馆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交通警察也说：从未见过这么多车辆。数千拥挤的人们，怀着悲切的心情等待着与父亲告别。那令人感动的场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令我们时常忆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到他那种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是这伟大的人格感动着人们的心，使他永远留在人民的心怀中。作为他的后辈，我们为他的逝世而悲痛，也为他革命的一生而鼓舞。我们将接过父亲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沿着他走过的革命之路，跟着党去开创新的伟业。

朱良才这个名字，曾经同许许多多的当代名将一起，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闪闪发光。然而，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功劳从来不在人前提起，即便对我们兄妹，也绝口不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本人无法拒绝一些传记、回忆录对他的记述和赞誉。我们对父亲的了解，正是从这些记述和赞誉以及他生前的言谈举止中获得的。在父亲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写下这篇回忆文章，记述父亲一生事迹的片断，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光荣

我们的父亲朱良才，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一个破产富农的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日贫，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从事耕织，还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嗣后，他不顾家中的阻拦，考进了衡阳诚德中学。正当他孜孜不倦地读书时，军阀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停课，他只好回乡教书。目睹身受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父亲饱尝了岁月的艰辛。一种对旧社会、旧制度不满的情绪，逐渐充溢在他年轻的胸臆中。1925年夏天，正当北伐战争爆发之际，湖南全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父亲就在这时候怀着拯救民众、反抗压迫的志向，毅然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踏上了漫长、艰难的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身为乡农民协会组织委员的父亲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吊打、百般威逼之下，父亲毫不屈服，勇敢地向敌人表明了“宁死不屈”的气节。有一天，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有个叫赵薪传的宣传科长来到狱中。他问父亲：“如果放你出去，你还干不干？”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还干，我就是要干革命。不打倒列强和土豪劣绅，中国就不会强盛。”听到这样的回答，赵薪传暗中给父亲出主意，让父亲写信控告靖卫团长何其朗收缴民间枪支的罪行，并说只要把他告倒，就能获释。这个何其朗与范石生矛盾很深，范石生想寻找机会缴他的枪。父亲和其他农协会难友按照赵薪传的授意，联名给范石生写了一封控告信。不几天，何其朗就被抓起来，他的三百多支枪也被缴了两百多。与此同时，父亲等人也被释出狱。事后父亲才知道，赵薪传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父亲出狱后，继续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家里仅有的七亩地也被逃出监狱的何其朗所抢夺。但是，父亲置个人安危和家庭遭遇于度外，更加积极地组织秘密农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9月，正当大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之时，汝城来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何日升。他见父亲对敌斗争十分坚决，有勇有谋，就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兴奋地说：“我搞了几年农民协会工作，今天终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被捕的时候，差一点儿被敌人当成共产党员杀了。今天我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就是死了也甘心、光荣。”

在后来数十年革命生涯中，父亲历尽艰险，受尽磨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尤其是在许多危难的关头，他愈发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父亲入党以后，旋即带着何日升同志的密信，于1928年2月奔赴耒阳参加了朱德、陈毅的部队。4月，跟朱德、陈毅同志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从此，父亲开始参与了我们党领导下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不久，父亲被派往四方面军部队工作，任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在草地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父亲积极宣传中央的路线，宣传革命的团结，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草地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同心同德跟党走，革命就一定会胜利。”他的这番话，本意是想鼓舞士气，战胜困难，谁知却因此而惹了大祸。当时由于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抗中央的错误路线，因而就有人抓住这些话开会批斗父亲，甚至想杀害他。幸好徐向前同志赶来参加会议，父亲才幸免于难，被作了降职使用的处理。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公正的处理，父亲并没有丧失坚定的革命意志。他顾全大局，一直忍辱负重，始终艰难而又顽强地开展工作。有一件事，最能表现他作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奋斗不息的伟大人格。1937年初春，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西路军出师不利，被敌人打败，损失惨重。那时，父亲担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他随零散部队突围之后，只身一人沿途乞

讨，化装潜行，历经 36 天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机警地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追捕，才又回到了革命队伍。当他在甘肃镇原找到红军的时候，他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那样，禁不住热泪涌流。由于长期的紧张生活加上过度疲劳，父亲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说不出

二、决不让兽蹄踏进井冈山

父亲作为革命队伍的指挥员，具有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指挥才能。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参加了许许多多著名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赞扬。

1928 年 6 月，江西杨如轩、杨池生两支敌军部队分两路进逼井冈山，指挥部设在永新城。毛泽东、朱德同志在新、老七溪岭一带部署并指挥了一次歼灭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老七溪岭方面被敌人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对红军主力部队二十八团极为不利。正在这时，担任烟阁区区委书记的父亲率领数千名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正预伏在龙源口一带。得知这一情报，父亲立即指挥暴动队抢占了老七溪岭东山，与攻打制高点的二十八团相互策应。敌军由于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大部成了红军的俘虏，残敌则向山外逃窜。父亲又率领赤卫队、暴动队，配合红军主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永新城。

在嗣后两个月进行的黄洋界保卫战中，父亲更以他身先士卒、坚韧不拔的战斗作风和果断机智的指挥才能，受到红军官兵的赞誉。当时，处于初创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只有二十八、三十一两团，而且武器装备非常低劣。二十八团到湘南作战失利，毛泽东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接应。湘赣之敌乘红军主力远出之机，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大举进犯井冈山，企图对红军实施会剿。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上级把扼守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三十一团一营的一连

和二连，一连坚守主阵地。父亲这时担任该营一连党代表。接受任务之后，他在向全连官兵进行战斗动员时，号召“誓死保卫井冈山，决不让一只兽蹄踏进革命的土地”。他率领全连与三连紧密配合，机智勇敢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这块主要军事基地。对这次保卫战，父亲在一篇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敌人……开始来得还蛮凶。我们已下了决心，敌人来了就不让他们回去。战斗打得很激烈。战斗中，我们有的战士帽子都打掉了。我们连还分出了两个班，隐蔽在工事外敌人来路的两旁，从侧后出击。敌人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就这样，凭险守住了阵地。”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黄洋界保卫战时，曾经这样写道：“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来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后来，毛泽东还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歌颂这次保卫战的胜利。

黄洋界保卫战之后，父亲又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12月，父亲被调到红三军九师任政委。这时第一次反“围剿”刚刚展开。九师和八师奉命于龙冈附近阻击孤军冒进的敌张辉瓒师。阻击战从早晨打到午后，战场上出现了拉锯状态。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敌特分子从侧后向正在指挥战斗的父亲打黑枪，周围的同志赶紧还击。父亲却毫无惧色，仍然坚守指挥位置，沉着地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直到援军到来，才一起全歼了张辉瓒师。这一仗，缴获枪支八千多，父亲所在的九师缴获枪支二千多、大炮一门、电台一部，并俘虏敌电台全部工作人员。从此，红军建立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1931年5月，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父亲按照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的部

署，率领全师从5月16日至30日的半个月內，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先后在将军帽、九寸岭等地歼灭敌人三个师。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父亲率领九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根据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敌军据点之间穿插前进，歼灭了敌人两个师的人马。尔后，又佯攻龙冈，配合兄弟部队出其不意地歼灭了敌军一个师。接着，父亲指挥全师冒着酷暑，急行军赶赴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高兴圩、老盘营一带，全歼敌人一个旅；在石岭一带，歼灭敌人一个师。不久，父亲又率领九师参加了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把生死置于不顾，到最危险的前沿指挥战斗，坚守了阵地，挽救了由于师长彭松雄的错误指挥造成的败局，并与援军一起击退了敌军。

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冷枪打断，鲜血染红了半个担架。他被抢救下来后，草草地用土法接上断臂，伤口还未愈合就又返回部队，到总部报到。周恩来总政委看着父亲用绷带吊起的手臂说：“伤好了吗？”父亲大声说：“没问题！好啦！”周恩来说：“好，来得正好。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的领导没有作战经验，几仗没有打好。现在敌人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你去当政委，马上到职。”这样，第二天父亲就同军长一起指挥了草台战役，配合主力部队歼敌一个师，打了一个翻身仗。但是，因为治疗不及时，他的断臂终究未能痊愈，成为终生残废。

实践出才干，时势造英雄。父亲的果敢精神和指挥才能，正是在严酷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杨成武同志在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中这样评价父亲：“良才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成熟、老练、坚定，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很善于用党的决议和指示宣传教育部队。因此，他率领的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很强。”

三、一切为着政治质量的提高

父亲毕生从事政治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之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无论在基层工作，还是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从来不说空话、不图虚名。这种工作作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朴实而崇高的伟大人格。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担任三分区政治委员，之后又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主任。在那一段艰苦的岁月里，他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向部队作过许多重要的讲话和报告，为军队刊物写过许多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这些讲话、报告和文章，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联系大量的实际材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他作的《晋察冀创造模范党军铁军概述》的报告，就是很好的例证。

1941年1月，日寇对华北解放区实施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的所谓“总体战”。同年7月，日寇再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面对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父亲要求各级干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根据军区提出的“创造党军铁军”的号召，提出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创造模范的党军铁军”的竞赛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部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人的因素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总结这一活动的报告中，父亲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提高政治质量的重要性。他说：“在连战七夜的磨河滩战斗中，我们一个连攻击敌军五百人的机械化部队，我虽伤亡过半，但没有一个动摇逃跑的。甚至因被河水隔断失掉联络的人员，在党员的领导下，依然开展麻雀战，不丢伤员，不丢武器，终于归队。在龙梁战斗中，我们一个连受到极大的损失，只剩20余人，连长与支书负伤，党员

自动代理指挥，完成了任务。三甲村歼灭战中，我们一个排伤亡仅剩3个人，最后指导员振臂一呼，仍将敌人堡垒攻占。至于战斗中个人的英勇例子就举不胜举了。”他的最后结论是：“没有政治质量的提高，这样英勇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父亲作为模范的政治工作者，一生中的大量精力正是倾注于部队“政治质量的提高”上。他总是着眼于部队的根本建设开展工作，对部队党的建设，始终抓得很紧。建国以后，父亲历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直至1958年离职休养。在这七八年时间里，他始终不忘用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部队，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50年代初期，我军借鉴苏联的经验，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当时有人主张“不要再提党的绝对领导”，认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就连军区政治部，也有人受到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父亲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军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不能废除“两长制”，不能丢掉优良传统。有一次，军区部队举行军事演习，一位苏联总顾问建议砍掉一片妨碍演习的果园，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在答复请示时明确地指示：“这片果园不能砍！”事后又耐心地向这位总顾问解释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拥政爱民的传统。

在长期的政治工作实践中，父亲十分重视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把工作做活。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领导了《抗日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人们亲切地把它们称为“三支文化轻骑兵”。两种刊物经常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形象逼真的图片，及时宣传抗战形势和著名的战役战斗，反映敌后军民的斗争生活，对揭露敌寇、动员群众、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剧社则以舞台作战场，以艺术为刀枪，热情讴歌抗日军民，无情鞭笞凶恶敌人，甚至把戏演到日伪军的碉堡下，把标语贴到伪县政府的墙壁上。这支“轻骑兵”不仅创作

演出了《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战斗里成长》、《李国瑞》等大量优秀剧目，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这些同志在回忆当年的战斗生活时，都难以忘怀父亲的辛勤培育。两年前进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著名电影艺术家田华站在父亲的遗体前，禁不住热泪如泉。她忘不了当年在剧社时，父亲对她的关怀和培养。

四、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父亲的伟大人格，还表现在他对待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组织的关系上。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正因为有了这种“勤务员”的思想，他能够处处以宽阔、坦荡的胸怀，关心和爱护干部，挺身而出地保护人才；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勤务员”思想，他能够一生严于律己，恪守党内生活的准则。他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动，不仅深得部队官兵的信赖和爱戴，而且为作为他的子女的我们树立了崇高榜样。

早年父亲在军委卫生部工作期间，就曾以极端负责的精神，组织医疗抢救工作，挽救了许多红军官兵的生命。在长征的艰难岁月里，父亲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他把仅有的一点儿粮食让给饿昏了的红军战士，把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儿狗肉送给病号。“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这点点滴滴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在当年却是多么难能可贵呀！50年代，在北京军区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观摩大会上，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朝福同志紧紧握住父亲的双手，感激地说：“我永远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原来，李朝福同志就是长征途中得到父亲“粮食支援”的许多红军战士之一。

父亲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同志，更注重从政治上爱护同志、保护人才。他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交涉，营救了大批革命力量。有一次，他在街上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步兵团有不少老红军，就马上报告办事处

主任谢觉哉同志。经过深入调查，多方联系，同国民党有关方面反复交涉，终于把这些同志营救出来。其中有些同志后来成了我军的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造反派”纷纷找到父亲，威逼他写其他老干部的“黑材料”、“假证明”。有的“造反派”甚至打着中央文革某某领导人的旗号，向父亲施以高压，让他在早已编写好的“证明”上签字、盖章。虽然此时父亲的处境也已不妙，但父亲始终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谬论战胜不了真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谁也改变不了。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无耻挑衅，父亲不仅毫无畏惧地顶了回去，还不顾自身安危为一些身处绝境的老干部做了公正、有力的证明。他总是说：“这位同志我了解，是个好干部。”他的一句话曾使许多革命干部和优秀人才摆脱了困境。

从小时候起，我们兄妹几人就爱缠着父亲让他讲打仗的故事。闲暇的时候，他也爱给我们讲。从井冈山斗争讲到两万五千里长征；从太行山上打鬼子，讲到和平解放北平。可是，每次他都只讲别人，不提自己。我们总想让他讲讲自己，他总是笑着说：“讲叔叔、伯伯们的事不是很好吗？”上小学时，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朱德的扁担》这一课，都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很爱读，也深受教育。但文章的作者是谁，直到我们长大了，才从《星火燎原》上发现，原来是父亲写的。不仅我们最初不知道，而且由于父亲坚持不让署名，以至受教育的几代人，几乎都不知道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是谁写的。

在家中，父亲从不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对外界，他更是反对宣传自己。建国后，党内几次号召大家写回忆录，也有不少老同志动员父亲写。可是父亲除写了几篇有关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回忆录以外，有关自己的他一篇也没有写。

50年代末，《星火燎原》编辑部送来了一、二集的征求意见稿。其中《黄洋界保卫战》一文的作者误将当时担任黄洋界保卫战主

战连——红一连党代表的父亲写成了作者自己。可父亲看后一笑置之，未说任何话。事过多年，当年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的红一连、红二连的几个老同志都提出了更正意见，作者本人也提出是自己记错了。这时，父亲才对编辑部的提问做了证实。同时，父亲还特意强调：“黄洋界战斗打胜了，但胜利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因此，要宣传就应该宣传所有参加战斗的红军指战员。”根据父亲的这个意见，以后该书再版时，就略去了主要指挥员的名字。

父亲一事当前，总是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得失，一心考虑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利益。战争年代，父亲曾几上几下，有一次，甚至从军政治部主任降到团长。但是，不论是升是降；是工作需要，还是政治迫害，父亲都是毫无怨言地赶赴新的岗位，继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1958年，父亲58岁，是北京军区政委。他从培养接班人和有利于工作出发，想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上去。有的同志劝他，可以一面治病，一面工作，不要全退下来。父亲对他们说：“如果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自然在台上好。可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还是退下来好。”1959年1月，北京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父亲又给军区党委写信，要求免去他的党委委员职务。父亲的行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周总理赞扬他“顾大局、识大体”，邓小平同志称赞父亲是“开明人士”。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曾对秘书说过：“规定应该我享受的，你去领；不该我享受的，别人送来也不能收。”他对全家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我们家树立了一种良好的家风。对于我们兄妹几个的入党、提干和工作安排，他是从不插手的。他总是那句老话：“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是普通老百姓，不能搞特殊，不能靠父辈的功劳生活，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为人民建功立业。”